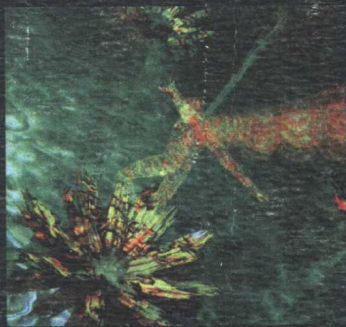


先锋诗歌



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90NIANDAI WENXUE CHAOLIU DAXI

李复威 主编

唐晓渡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I227
121

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

李复威 主编

先锋诗歌

唐晓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锋诗歌/唐晓渡编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9

ISBN 7-303-04990-8

I. 先… II. 唐…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43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2.25 字数:307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20.00元

总序

□李复威

二十世纪的历史帷幕正徐徐落下，在世纪之交之际，文坛沉浸在回眸与前瞻的思考的氛围之中——总结这一世纪文学演进的成果和经验，展望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的前景。九十年代的文学情境已自然成为百年来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其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兴趣。

—

也许是经历了多年的实践的检验，在尊重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呼吁下，文学界逐步摒弃了编写、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政治变迁为依附的分期方法，渐次树立起“世纪意识”与“十年节奏”的发展观。十年，虽然时限比较短暂，虽然起始和终结的界限难

以泾渭分明，但是，它往往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生态环境，呈现出某种联通共存的凝聚性和沉浮变衍的阶段性的。德国作家歌德说过：“时代给予当时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文学情况亦然。这种“十年节奏”的确立，为我们采用编年史式的文学进程的研究奠定了共识的基础。

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成果的评估，人们一直习惯于将刚刚逝去的前一阶段作为最初的参照系，总是希冀能从中看到某些新的因素、新的发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发展源。这样，文学界顺理成章地热衷于进行着九十年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比较、对照。这种运作的初始，往往会使人陷入一种犹豫的心态和尴尬的局面。

毋庸置疑，八十年代是我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繁荣期。它走出了历史的泥污，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的转换：从创作的复苏到文学的振兴；从步调整齐的轰动效应到旋律驳杂的声部交错；从文学之门的开启到各种外国艺术潮流的全面引进；从创作倾向的多样化到美学思潮的多元化……有的评论家甚至断言，我国这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走过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演进历程。当年名家迭出、佳作涌现，出现过尊重作家、珍视文学的浓烈的社会氛围和超强的价值观念，如茅盾先生所言：“……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有口皆碑”。尽管八十年代文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无疑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历史起点。

九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态势与八十年代后期并无鲜明的界线。许多重要的文学特点和现象都是顺势沿袭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呈现出的“文学圣殿的倾斜”、“作家光环的暗淡”、

“轰动效应的失却”等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作家圈内，有的辍笔、有的改行、有的下海……令人困惑不解。文学创作的纷纭之态也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铺天盖地而来的通俗文学几乎将严肃文学排挤得无容身之地。难怪当时有的评论家一度以“衰落”、“危机”、甚至“死亡”等极端化的字眼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及至九十年代中叶，经过一阵混沌状态之后，文学情势方逐步显露出一些独立的品格和异样的气质。

二

世界冷战局面的结束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日益强化，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形成九十年代文学演进的大时代条件。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观念的不断深化，图书竞争市场新格局的出现，作家写作方式的现代化改善，文化传媒手段的丰富化……造就了九十年代文学存在的具体的生态环境。这一切因素无疑制约了这十年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总体构架。

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引起了人们生存形态、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习惯、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的变衍。这些变衍一直还处于追寻、比较、探索的时期，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规范的价值定位。文学的发展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身不由己地接受着方方面面更多的、更复杂的、更微妙的挑战。在文苑内外，见仁见智的歧义、不同看法的矛盾、各自好恶的差异……司空见惯，俯拾即是。这样的态势恐怕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而处于转型期磨合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只能在无序中的梳理、驳杂中的筛选、困惑中的反思中，日臻显现出自己清晰的形象。

面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型，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策

略必须是、也只能是及时地趋时应变。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在美学意义上的文学多元格局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平实的、稳健的一步。人们一直认为可能属于短暂性质的多元形态逐步走出了幼稚阶段。在九十年代的中晚期，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构筑成了一个吸纳多元、展示多元、标准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多元、发展多元的开放体系。这其中，有宽容和理解，也有争议和撞击；有独立的宣言和自我的领地，也有相互的渗透和局部的重叠。同存共荣是凝聚多元的目标与追求。这是令人欣喜的开放体系——我们的文苑真正出现了百鸟欢叫、百树争荣、百花竞开的局面。如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所言：“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这是来之不易的开放体系——它不仅是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结晶，也是文学经历种种曲折坎坷后的经验总结，是文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需求的必然产物。这是渐趋成熟的开放体系——它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坛的实际不断地平衡着、调整着文学发展种种轻重缓急的关系：切近现实与美学探索，追求理想与适应现状，市场色彩与艺术品位，教化功能与娱乐作用，大众水平与超前意识，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化进程与同世界文学接轨……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社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机制在各 部门、各行业、各个领域也纷纷健全和完善起来，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竞争，为推动时代进步而竞争，为激活、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竞争，自然成为九十年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内容，也成为文学创作主题内质的基本要素。反腐倡廉文学、改革文学、都市文学、乡镇文学、社区文学……都在这一中轴线上寻觅到自己倾斜的重心。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人生的活剧、情感的波澜、人性的开掘等都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的特征。

三

多元格局的开放体系的形成，给九十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在相当数量的先锋文学作家创作纷纷转向之后，九十年代中期，一股势头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显示出创作的活力。一批立足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中青年作家，积极关注当今转型期现实的热点问题，以平民的意识去探求、思考改革中的种种无奈和隐患，表现出分享艰难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精神。尽管这些创作还有不小的缺憾，但其反拨的意向和冲击的效果是有启示意义的。联系到当前世界文坛上的回归社会现实、回归文化传统的潮流的涌现，这股冲击波无疑还给我们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学发展的信息。

随着我国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和都市人职业结构的变衍，原有的以小农经济形态为背景的市井文学和工业题材文学在名副其实地向现代都市文学转化。渐趋浓郁的都市文化意蕴，日益绚丽的都市生存景观，全面开放的都市文明观念，愈显个性的都市风俗世情……交织构成都市文学的创作特色。都市规模的宏伟化、社会消费的超前性、金融意识的成熟度、科教地位的尖端性，以及都市人的新的人际矛盾、欲望追求和精神困扰……给都市文学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传统意蕴最为浓郁的乡土文学，也因为乡镇工业的发展、城乡交流的加强和农村人现代意识的进步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进程。

八十年代中期已展露丰采的女性文学演进至九十年代，由于一批晚生代女作家的加盟更显出骄人的成绩。三代人顺承的女性作家汇集成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集团，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中纵横驰骋。这在一向以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实属一道罕见的景观。

被人们称为“时代的纪念碑”和“文学的重型武器”的长篇小说在九十年代创作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平均每年八九百部的数目已相当于建国后十七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不多。当然，也有少量积作家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而成的巨制，显示出难得的经典风貌和史诗气魄。杰出的长篇小说往往是文学发展成熟的优生儿，是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标志。众多作家正在为这样的作品的诞生辛勤地笔耕着。另外，九十年代的学者文学在散文园地上成绩斐然。他们重点以随笔和杂感的形式领悟人生、反思历史、探求哲理、针砭时弊，表现出激情的深沉和睿智的超越。其它还有以创造性的虚构成写作而形成的现代寓言文学，以表现人物心理流变而见长的情感分析文学，以现代思维探险熔铸而成的幻想文学等，也都日渐成为九十年代文苑的一朵朵奇葩。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雅文学与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走向。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值得汲取的“营养素”。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特别是一些雅文学作家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应到看到，九十年代的这种雅俗互补、乃至合流的势头是时代条件、社会国情、文化状况和文学规律共同促成的一种综合效应。雅俗互补、合流并不是在二者之间求得一增一减的平均值，而是共同获得一个再提高的基点，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内，相对出现的合流又会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出现疏离，在先锋文学的创新中渐趋分化。这个周而复始的螺旋式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文学进步、升华的过程。

与八十年代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相当数量作家的心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调整自己与变幻不定的种种文学思潮的关系；调整与不同观念和个性的各种类型作家间的关系；调整与层

次各异、趣味有别的不同的读者群的关系；调整与频频变异、难以捉摸的图书市场的关系……在适应多元格局的竞争态势下，求得自我的定位生存和不断发展。浮躁之气渐少，平实之风益多；急功近利之态渐弱，潜心创作之心益强；玩文学的气氛渐淡，职业的敬畏感益浓。尤其是一些个性突出、风格鲜明、勤于探索的作家，在争奇斗艳的美学园地中反复采撷，含英咀华，深层次地把握文学的特点及规律，从群体性走向个体性，从代言人走向自言人，从共语式走向独语式，以私人的角色选择，表达生命的独特冲动；用自我的异样感受，领悟人生的内在奥秘；在个体的精神家园内与心路历程中，寻觅到自己与世界对话的特殊语境和模式，从而进一步展示出艺术的本色魅力，充分发挥其在真、善、美领域内的潜移默化的功能。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标示出九十年代文学创造自己优势的契机，播下未来希望的种子。

四

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过渡，从闭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过渡是二十世纪我国文学演进的总轨迹。在百年来的漫漫历程中，文学经受了阶级搏杀的磨砺，革命烽火的洗礼，反抗侵略的锤炼，新旧转折的欣喜，文坛左右的纷争，百花凋零的浩劫、吐故纳新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文学尚不能给这个过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趋时中固有的芜杂，多元中兼存的混沌，发展中显示的无序，创新中蕴含的浮躁……仍然表明九十年代文学在这个历史的转变中的不成熟性和未完成性。当然，九十年代文学毕竟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制约中取得了经验，从七十年代文学的衰败中总结了教训，从八十年代的轰动效应中得到了启示，多了几分主见和豁达。它一方面在社会全面走向市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急速变化的情势下，找准自己的角

色定位，别无选择地趋时应变，求得必要的生存权；另一方面在传统地位余波的影响下和现时变革的适宜的机遇中，翘首前瞻，蓄势待发，把希望和辉煌更多地留给明天。

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说过这样一段蕴意深邃的话：“旧时代的庞大的文化遗物证明，建筑术上最伟大的作品，与其说是个人的创造，不如说是全社会的劳作；与其说是天才光辉的闪耀，不如说是人民创造力量的结果。这是各个民族的遗产，多少世纪留下的积层，社会逐渐蒸发的结果所形成的结晶。一句话，这是特种的有机结构。时代的每一个浪潮都在文化遗物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每一代都留下自己的一层，每一个人都填上自己的石块”。这段话同样表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程序，启示我们深入思索二十世纪及九十年代的创作业绩和历史地位。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青睐赋予二十世纪特殊的魅力：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世界大战，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腾飞，科学进步促使人类文明的跃进，现代意识在精神领域中的全面觉醒，世界政治格局的无穷变幻，人类多领域的一体化趋势……处于世纪末这一特殊阶段的九十年代文学无疑也会在我国文学的“积层”上留下自己的“冲积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适应现代人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适应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眼下，它还算不上是色泽清晰、层次分明、构造凝聚的优质土层，但它却是为下一个世纪文学发展而铺垫的饱含着多种多样营养素的底肥。在这一点上，我想它是不会推卸责任和自惭形秽的。

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近四百万字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这套选本以十年为期，筛选梳理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并加以评估，其欣赏的作用、总结的意义和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海内外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丛书很

快销售一空。一九九二年增编再版一次，仍供不应求。

当代人总结同步趋进的当代文学，固然有历史沉淀度和能见度不够的局限，但也具备自己的优势：最熟悉文学演进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态势，最了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心曲隐衷，最能体察同代读者的审美流向和阅读趣味。这种及时的、初步的研讨，一方面对作品的现实价值作出第一手的评判，另一方面也给后世研究这段文学史留下当代人的真切感受和翔实信息，给未来的历史裁决提供新鲜的素材，无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九十年代即将结束，该出版社又以令人钦佩的更大魄力和更多投入，决定将这总结十年文学进程的“传统工程”继续下去，筹划出版了这套十八册近七百万字的《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从八十年代的“新潮”到九十年代的“潮流”，这称谓上的更换也标示出这两个十年文学态势上的某些差异。九十年代的众多作品群，往往徘徊在文学现象与美学思潮之间。比一般的“现象”似乎多一点集中的倾向性，较之“思潮”仿佛又欠缺一些必要的艺术哲学的根柢，故以“潮流”命名之，较为妥帖。或以题材分类，或以形式归纳，或以方法集中，难以强求一致，只得不拘一格，恐怕也只有如此方能全面展示九十年代多元文学的真实形态。此次有幸请到众多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参与编选，保证了丛书的品位和质量。

当前，我国图书市场上的“选本热”仍居高不下，且有过多过滥、冗杂重复的倾向。许多读者对此也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我想，这并非是选本样式自身存在的问题。古今中外，文学的选本是从未间断过、也不可能间断的。选本的角度新颖，选家的慧眼独具，能取所需于一册，览精华于一体，恐怕是选本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无疑出版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书所选均属九十年代内书报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鉴于篇幅的缘故，所选作品以中篇、短篇

为主，有关的长篇只得割爱。作品原则上以发表时间前后为序排列。个别选本因内容需要未按此例。有的应入选的作品因作者授权问题未得顺利解决而未能选用。

如果我们的这种努力能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梳理和总结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那就会感到十分欣慰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序

唐晓渡 □

在“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的名下编选这样一卷诗或许隐含着一个小小的悖谬，因为九十年代诗歌有别于八十年代的特征之一就是看不出有什么清晰可辨的“潮流”。把考察范围进一步限制在似乎负有“领导新潮流”天职的先锋诗歌范围内，这种悖谬会变得更加显豁。当然也可以干脆以悖谬对悖谬，说这里无意于“潮流”恰好是某种“新潮流”。

然而为什么总是绕不开“潮流”？是不是因为凡事一旦被命之为“潮流”，就同时意味着大势所趋，不可抗拒？就意味着攻取了某一话语制高点，自动获得了某种不言而喻的价值？就意味着不仅可以顺应“潮流”，而且可以“反潮流”，进而成为这方面的“英雄”？假如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许多人宁愿是这样），那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个词加上括号，悬置起来，以便让时间清洗掉积存其间并散布在语境中的毒素。

因此，本文对九十年代先锋诗写作的描述、阐释，以及对由其所提出的若干问题的探讨，都和“潮流”无关。或有同仁对继续沿用“先锋诗”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但为了在八十年代的对比中更有力地揭示出某种内在的变化，只好暂时存而不论。如果你愿意，不妨也把它打上括号。

1. 中断和延续 在整个八十年代一直保持着强劲势

头的先锋诗写作，面临九十年代突然陷入了不可名状的命运颠簸之中。首先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天才的海子以二十五岁的年纪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仅仅时隔两个月多一点，另一位在朋友间享有盛誉的诗人、海子的挚友骆一禾，又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去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诉诸语言来表达这一系列的打击在人们心头激起的巨大震惊和伤痛。

然而我无意为先锋诗在九十年代的境遇勾勒一幅灾难性的背景；事实上，当代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所具有的、往往以戏剧化方式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已经令我无法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灾难性”一词。这不是说灾难本身也被戏剧化了，而是说人们对灾难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浸透了浓厚的戏剧色彩。在强迫性遗忘机制和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屈辱经验（包括道德上的不洁感）所导致的欣快症倾向的双重作用下，它似乎不再具有被遮蔽的、可供探寻和汲取的现实内涵，更谈不上凝聚力和灵魂的净化作用了。它既不能唤起恐惧（由于有太深的恐惧），也无从令人振奋（一种太纯粹的诉求），其功能介于颓唐和亢进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所尝试的那样^①，从“专注于写作本身”的角度论述先锋诗以一九八九为契机实现的“历史转变”，或许更为正当。不过，有些问题因此也就变得更需要深究。欧阳江河写道：

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一九八九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后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的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

^① 欧阳江河：《89' 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原载《今天》一九九三年第三期，一七八页。

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

确实，“深刻的中断”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感受。作为“后果”的后果，这使得本来就非常可疑的写作的意义在一些诗人那里几乎是转眼间就沉入了虚无的深渊；而对另一些诗人来说，“写作将如何进行下去”已不只是某种日常的焦虑，它同时也成了陈超所谓“噬心的时代主题”。然而，把造成这种“中断”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一系列事件的压力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除非我们认可先锋诗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对历史的消极承受。时过境迁，在最初由于尖锐的疼痛造成的幻觉有可能代之以较为平静的回顾和反思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根据诗歌自身的发展，说它们充其量起到了某种高速催化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中断”无论有多么深刻，都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戛然的突发事件。它既很难支持“开始”和“结束”这样泾渭分明的判断，也无从成为衡量作品“有效”或“无效”的标尺。关于这一点，只要阅读一下欧阳江河自己的两个组诗，即《最后的幻象》和《致友人》，就不难得到印证。这两组诗同样不缺少他所说的“那种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和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作”资质；但前者尽管写于一九八八年十一至十二月间，却已通过标题透露出足够鲜明的告别意向；而后者尽管写于一九八九年九至十月间，却非但没有结束漫长的告别，反而一再撞响那“有时比一个时代的终结更为辽阔”的“弥留之钟”。更有说服力的是，它们即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令我们感动，甚至比当初更感动；换句话说，它们并没有因为与一个业已逝去的时代，或某种已成昨日黄花的写作方式的致命关联而“失效”，至少在阅读层面上如此。

但这样一来，所谓“深刻的中断”岂非被抽空了意味？对此我的回答是，必须在同时考虑到“延续”和“返回”这两种倾向（不仅仅是相对于八十年代，但“回到诗本身”正是先锋诗在整个八十年代一以贯之的响亮追求）的前提下，并基于三者的互动关系，才能更深刻地领悟“中断”的意味。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一

个九十年代，它也不会在被我们经历后跌入万劫不复的时间深渊。这里作为历史的写作、写作的现状和可能的写作之间所呈现的并非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既互相反对，又互相支持的开放性结构；其变化的依据在于诗按其本义地在自身创造中不断向生存、文化和语言敞开，而不在于任何被明确意识到的阶段性目标——不管它看上去有多么重要。

不妨落实到具体的有关问题，例如，“对抗”这一先锋诗的传统主题在九十年代是否具有新的可能性问题继续我们的讨论。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先锋诗极为敏感，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全球性“冷战”时代宣告结束后又显得额外不可回避的所谓“意识形态化写作”，诗人们就此表现出高度警觉是必然的；因而，可以把欧阳江河于此所持的否定态度理解成某种“过度阐释”式的策略。但断然宣称对抗主题的可能性“已经被耗尽”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不应把在当代现实和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对抗因素和“意识形态幻觉”混为一谈一样，我们也应该仔细甄别使对抗主题在向变化着的历史语境敞开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简单地重复早期“朦胧诗”那种意识形态对抗之间的差异。饶有兴味的是，欧阳江河本人恰恰属于率先寻求这种“新的活力”的诗人之一，并且很可能走得最远。

欧阳江河的双刃剑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时劈向了写作和阅读。它同样要求一种与“新的可能”相匹配的新眼光。这里，对形形色色的诗歌成见的警觉，较之对“意识形态化”的警觉并不显得更不重要——二者有时简直就是一回事。就“对抗”主题而言，像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或周伦佑的《刀锋二十首》，或孟浪的《死亡进行曲》那样作尖锐而集中的正面处理，往往标示了人们的接受边界，充其量可以扩大到例如陈超的《博物馆或火焰》那种熔忏悔录与升阶书于一炉，在个人宿命和“两个时代脱钩”的龃龉间展开的命运交锋；而像《傍晚穿过广场》那样致力消解的反面处理，或像翟永明的《颜色中的颜色》那样，使其融入另一个平行的主题及其变奏的更大织体中，则很容易遭到忽视乃至无视，就不必说王寅《灵魂终于出窍》式的秘响